

引 言

从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到 20 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百余年间，是中国文学体系发生并基本完成整体性、历史性变革的时代。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灿烂的历史、但在封建社会后期已形衰微的中国诗歌，也经历了由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界诗林，再创辉煌。

的确，中国的古典诗歌，以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和辉煌成就，至今被尊为世界文学库藏中的瑰宝。从公元前 6 世纪结集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诗歌的创作年代则约在结集前的五百年间），和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直到 18 世纪清代中叶，将近三千年间，古典诗歌长河涛涌，绵延百代，名家灿若星辰，诗集浩如烟海，流派盛似繁花。无论历史之悠久、诗境之广阔、内涵之丰厚、艺术之精美，在世界古代文学历史上都是无与伦

比的。

然而，就古典诗歌自身发展看，却并非始终曲折向上，而如山峦起伏，经历了前后盛衰的变化过程。大体上，古典诗歌在唐代达到了辉煌的巅峰，涌现出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一大批伟大和杰出的诗人，艺术形式也已完善成熟。宋代诗人进一步拓展诗境，而已落唐人之后。宋代以降，虽代有才人，但在总体上，诗歌发展已渐显停滞趋势。经历了长期发展的古典诗歌，已经形成一套相当完备的、既有规范性又有包容性的诗学和创作体系。它确立了“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等“诗教”为中心的思想伦理原则和审美规范，构建起五、七言古近体诗讲究音韵、声调、对偶等格律体制，并且在创作实践中代代传承而形成了一系列通用的意象范型和语言模式。在遵循这些规范的前提下，也容许不同题材、风格、流派存在。但是，随着封建社会进入后期，这一体系已由定型而趋凝固。明清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强化了对文学的规范性要求，缩小了文学的包容性，限制了诗人的创造力。闭关锁国造成的相对封闭的人文环境，几乎恒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和文人地位，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教育下文人的思维

惯性，这些，是诗歌创作体系保持稳定的条件，也是造成它凝滞的环境。到 19 世纪初，诗道衰微之态势已很明显。当时一位诗论家批评诗坛状况是：“分曹咏物之作，酬和叠韵之体，谀颂悦人之篇，豆钉考古之制，穷工极巧，弥漫浩汗。”古典诗歌的衰势已透露出它将面临变革的必然性，只是还缺乏相应的社会条件。

这时，中国以外的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欧洲英、法等国相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开展工业革命后，开始向全世界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1840 年，英国终于把侵略的炮口对准了庞大而已衰朽的东方古国。中国，在血泊中呻吟着、蹒跚着步入近代。

此后百余年间，中国从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从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使中国陷入被宰割，被掠夺，长期贫困、落后的深重灾难，甚至濒临民族危亡的险境。

然而，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历史经历了曲折，却不能改变时代潮流和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必然。中国人民展开了反抗侵略者及与侵略者勾结的统治者，以“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

战争”。同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救国、强国道路的长期探索，不断以世界先进的社会制度为蓝本，提出各种改造社会和创建新中国的方案，并为之奋斗。从“师夷长技”到变法自强，从戊戌改良到辛亥革命，从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发展。终于在现代社会主义潮流影响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百余年间，有些斗争失败了，有些不彻底，但每一次改革和革命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都发生了一系列近代性变革。“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传入，新生产力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世界先进文化，从资产阶级启蒙文化、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相继传入，并被根据中国的需要选择、吸收和改造，以重建中国的民族新文化。在社会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的社会理想、道德观念、人生取向，乃至审美情趣等等，也逐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概言之，近代历史，为诗歌营造了一个与前此数千年完全不同、而且在不断急剧变革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曾经是古典诗歌维持稳定和凝滞的那些条件，逐一被打破，诗歌体系发生了历史性转换。这一转型过程，大体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古典诗歌形式内，开始冲破封建思想原则和“诗教”束缚，形成以反殖民主义侵略、腐朽封建统治为特征的近代诗歌主潮，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为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性质的“诗界革命”，为新诗的诞生做了准备；与此同时，沿袭传统的学古诗派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走向终结。在这一基础上，五四文学革命全面冲决古代文学的思想规范、形式规范和语言规范，创造出最初的白话新诗。新诗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迅速成长，并从西方诗歌、中国民歌和古典诗歌优秀遗产中吸收艺术经验，逐渐成熟，形成了现代化、大众化、民族化的新诗形态。

诗，是最能够敏锐、直接地感应社会和时代脉搏的文学体裁。百余年间的诗歌主潮，呼应着反侵略斗争和改革、革命运动的发展，感受着屈辱，爆发出愤怒，呼唤着抗争，描绘新的事物，追求新的理想，表现新的人生，成为

全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和它所激起的感情波澜的艺术纪录，展现了整个民族觉醒、奋起、更新和成长的精神历程，也留下了一代又一代诗人艰难探索，不断变革创造，实现诗歌伟大转型的轨迹。

一 古典诗歌的新变与衰变

19 世纪初，封建社会已经临近黄昏，走向没落。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清王朝的腐朽更加明显暴露。一部分士大夫开始觉醒，揭露弊政，力主改革，进而要求学习西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诗坛也发生裂变，出现发展方向不同的两股潮流。从龚自珍首开抨击专制、呼唤变革的风气，到反侵略与反腐朽统治结合的近代爱国诗潮形成和发展，代表了诗歌的新变方向，成为清末“诗界革命”的前奏。另一些诗派，仍持守学古取向，虽然也试图求变以挽回诗运，却因恪守诗教、泥于古道而相继衰微，在衰变中随清朝覆亡而终结。这一裂变过程，也是诗歌转型的开始。

1 呼唤大变革风雷的诗人

恩格斯曾经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

诗人但丁，称为欧洲“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这样一位古代最后、同时又是近代最初的诗人，他就是龚自珍。龚自珍首先是作为一位思想家，一位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风雷的呼唤者，进而作为近代“人”的觉醒及精神解放的启蒙者，出现在古、近代之交的。他那些表现出反传统精神和近代意识的作品，首开近代诗文新变风气，标志近代文学的开端。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生于官宦文学世家，外祖父段玉裁是著名的文字音韵学家。他自幼受过全面的传统文化教育，少年时就才华横溢，长辈们曾经希望他“努力为名儒、名臣”。然而，龚自珍并没能按照这一方向发展。他生活在嘉庆、道光之际，正是清王朝由盛而衰，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统治集团更趋腐朽，各种社会矛盾开始迸发，鸦片走私毒雾蔓延。青年龚自珍目击京师官僚的昏朽无能，尤其是 1813 年天理教义军杀人紫禁城这一震撼朝野的事件，强烈地刺激了他。当士大夫们还迷恋着盛世夕照余辉的时候，他已敏锐地觉察到，这个表面“类治世”的社会，其实已处于“衰世”。从 23 岁开始，他走上了社会批判道路，写下

《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章，广泛揭露社会积弊，在某些方面已触及封建制度问题。他指出，是“遇大臣如犬马”、“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的君主专制，造成整个官僚机器的庸弱瘫痪；他警告统治者，严重的贫富差距，“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他愤慨地抨击思想统制戮杀一切“能愤心、能忧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窒息人的灵魂；因而大声疾呼“自改革”。但是，他的激切言论，反而招来贵人飞语，群公嗔怒。这促使他更深沉地思考。³¹岁后所作《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沈论》、《尊隐》等文，表明他已从对现实的揭露，转向对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批判和哲学反思，从而萌生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思想。他鲜明地提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推翻了把所谓“天道”、“圣人”说成宇宙本源和人类主宰的传统学说。这是近代“人”的意识的最初觉醒。他针对思想专制提出“心力”论，倡言“自尊其心”，表达了思想解放的要求。他以比喻，暗示清王朝已经到了“日之将夕”的“昏时”，将沉入“夜之漫漫”，并将出现“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预言了未来时代的大变革。晚年，他更密切关注

鸦片走私和英国侵略的危险，坚决支持林则徐禁烟。

这些思想言论，当然不能为当时的统治集团所容。这位奇士，一生不得志于宦海。38岁才中进士，只做过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官，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50岁就逝世了。但是，他的思想却穿越历史的隧道，在半个多世纪后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时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的文学观，也渗透了他的启蒙意识和精神解放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向传统文学原则挑战，倡言变革。在《文体箴》中，他明确表示“耻”于因袭前人，追求“能创”，进而大胆地宣称：“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颂彼久定之云？”——即使早已被奉为天经地义的原则，也要重新进行理性审察；如果经过审察不能认同，那他决不因为这些原则久已确立就俯首遵从。此文结尾发出深沉的感叹：“一创一蹶，众不怜兮；大变忽开，请俟天兮！”前一句包含着一位开创者的艰难和酸辛，后一句则表达了对未来时代文学大变的期待和信念。这是近代第一篇文学变革宣言。

他所说“天地之久定位”的原则，就包括

了“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儒家诗学基本理论。这种理论，虽然承认诗歌是内心情感的表露，却要求用“礼义”来约束感情，把诗歌创作限制在封建政治伦理允许的范围内。龚自珍则公然表示：“夫我者，发乎情，止乎命而已矣！”他所说的“命”，不是天命，而指“人事之千变万化”。也就是说，除了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变化外，他感情的宣泄不受任何既定原则包括“礼义”的束缚。他进而提出著名的“尊情”论。“尊情”所追求的境界，是“诗与人为一……其面目也完”，诗人的“心迹尽是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捋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完”全地、不受束缚地表达诗人的心迹，“完”整地展示诗人的独立人格与个性，这就是“尊情”的内涵。

龚自珍的诗，正是这位古代黄昏、近代前夜后蒙思想家社会阅历和心灵历程的凝结。他突破了前人陈陈相因的意象模式，创造了一系列兼具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兼具雄奇和衰艳审美风格的独特意象。最有代表性的如“狂剑”、“怨箫”、“秋魂”、“少年”、“落花”、“风雷”，这些意象都具有深刻蕴含。

21岁那年，他填了一首《湘月》词，其中名句“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传诵一时。此后，狂剑怨箫，始终萦绕在他脑际：“佛言劫火遇皆消，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霄。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直到晚年辞官南归，他仍百感交集：“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剑和箫，陪伴了他一生，也凝结着他一生。

狂剑意象的内涵是丰富的，但主要是他排击黑暗的批判精神。他这样讥刺那些昏庸误国的“大官表师”：“委蛇（yí）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杀人何必尽砒霜，庸医至矣精消亡。”他把那些虚伪贪酷的贵官权相比作伪造的鼎镬：“徒取云雷傅汝败漆朽壤，将以盗膻腥。内有饕餮之馋腹，外假混沌自晦逃天刑。”著名的《咏史》是对长期专制统治下士大夫腐朽没落、毫无生气的写照：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算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他笔下甚至出现这样的诗句：“盲气六合来，初日照濛汜。抱此葵藿孤，斯人拙无比。”杜甫曾用“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来表达忠君思想。龚自珍却发出叛逆性的声音：在这浓重夜气（“盲气”）已遍布上下四方（“六合”），日沉西渊的时世，还抱着“葵藿倾太阳”的孤忠，真是愚拙至极！这确实是前代诗中没有出现过的后蒙思想的光芒。

怨箫的内涵也是多重的，而核心则是哀民生之多艰、忧国势之陵夷的忧患意识。“声满东南几处箫”，他的箫心往往与东南联系，包含着对沉重剥削下江南民生凋敝的伤心，也包含改革之志难酬的悲郁：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龚自珍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基于对封建社会没落的敏锐感受，表现在诗中是引人注目的“秋气”：“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于是，剑气和箫心交织，生成“秋魂”意象，这就是龚自珍内心的自我：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
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
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古代屈原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招魂》，而龚自珍的“秋魂”却无法招回，其中蕴含着对整个社会行将沉坠的清醒认识，以及他的清醒和疾呼都无法挽回没落趋势的悲慨和孤独。

因此，伴随“秋魂”的，是他对“少年”、“童心”的追忆和追求。在虚伪盛行的环境中，他怀念童心的纯真：“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在这世风日下的衰世，他更渴望恢复少年的豪情：“黄金白发两飘萧，六九童心犹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他写过一首《能令公少年行》，描绘了一个与萧瑟秋气相对的“珠明玉暖春朦胧”的幻想境界，一个与污浊隔绝的美好社会。这种憧憬固然朦胧虚幻，却说明他追求的“少年”时代，不仅是一种人格理想，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正因为此，20世纪初，梁启超读了这首诗后，写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要把老大帝国改造为少年中国，影响直至五四时期的少年中国

学会。

然而，那时的龚自珍，却只是一朵被高天烈风吹折的落花：“罡（gāng）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最后一句“默感恩”，是反话。沉默的缘由正是“玉皇”、“虎豹”，亦即“帝座”、“上相”的压抑——

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
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

.....

守默守雌容努力，母劳上相损宵眠。

“落花心绪”，包含着对思想专制造成万籁无言的愤懑和痛苦。还有一层，是对同样被压抑的人才的惜护之心：“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因此，与前人不同的是，“落花”并不颓丧。在七古长篇《西郊落花歌》中，他希望无数落花像屈死的伍子胥一样化作擂天大潮，像刘秀奇兵一样所向披靡。也因此，他呼唤风雷：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风雷”，意味着近代最早觉醒者对腐朽社会的失望和否定，对未来时代大变革和精神解放的期待。

在苦闷中，他也写过一些消沉之作，甚至想从佛学中寻求解脱。但龚自珍诗歌的主体则表现出鲜明的独创性和开创性。形式也不囿格律，“自周代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尤其是他辞官南归途中所作大型组诗《己亥杂诗》，共 315 首七言绝句，不仅写旅途闻见的社会情状，而且写出了一生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历程，可以说是一部用七绝写成的《离骚》。龚自珍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诗人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对革命派诗人柳亚子、高旭、陈去病、苏曼殊等等，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五四”以后的文学家如鲁迅、冰心、郁达夫等，也都喜好龚自珍的诗。

2. 近代爱国诗潮的初涌

19 世纪 30 年代，鸦片战争前夕，社会形势急剧恶化。林则徐、魏源等一批有识之士，力主禁烟，试行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诗坛风气也发生变化。福建诗人张际亮、浙江诗

人姚燮等，相继提出要转移诗风，“力挽颓波”，提倡“志士之诗”，创作也转向关注疮痍满目的现实、哀鸿遍野的民生和迅速逼近的西方侵略危机。

鸦片战争的爆发，在诗坛激起更强烈的波涛。英国的大炮，惊醒了中国，也惊醒了诗人；抗英的怒吼，震撼了大地，也震撼了诗坛。这场“乾坤之变”把许多诗人从“眼前景象属承平”的幻影中，一下子推进“昨夜管弦今鼓角”的现实。先觉者的衰世忧患意识，扩展为大批诗人的民族危机意识，从而形成了一股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诗潮。据现有资料粗略统计，此期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爱国诗歌，约有 200 余位作者的近 3000 首诗。其中有坚持抗战的重臣，也有投笔从戎的书生；有早已成名的老诗人，也有战火中涌现的新一辈；有汉族文人，也有少数民族作家；还有许多无名氏留下的竹枝词、纪事诗。就其规模而言，在文学史上也是相当突出的。

不过，这股爱国诗潮更主要的意义，还在于诗歌的内涵与性质，出现了一些新因素，表现出近代爱国主义的新特征。

中国爱国诗词传统源远流长。但是，古代爱国思想，往往与君国观念、忠君意识，以及